

文史小考

明清两朝夏县“知县文化”初探

□李思虎

乾隆二十八年，解州直隶州知州言如泗、夏县知县李遵唐分别为《乾隆解州夏县志》作序。该书目录分为16卷：卷之一简介夏县的沿革与疆域。卷之二为山川、风俗与物产。卷之三为城池、坛庙与公署。卷之四为学校、田赋、户口、仓储与兵防。卷之五为职官与宦绩（为官的政绩）。卷之六、七为选举，卷之八、九为人物，卷之十为烈女，卷之十一为古迹与祥异，卷之十二到十五皆为艺文，卷之十六为杂记。

我对卷之五颇感兴趣，其没有记载隋朝以前的县官，唐宋两朝较少，各为4人与6人，金朝仅提及1人王庭直，元朝也有7人载入。明朝设知县一人，县丞、主簿、典史各一，另有训导、教谕各一（清朝沿袭明制，取消主簿），县志分别记载了他们的籍贯、功名和任职年份。

我一一浏览这些县官的概况，颇有几分亲切感，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，其实，这些“父母官”与我们头顶同一片蓝天，脚踩同一方热土，这也算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吧。

掐指一算，有明一代，计有夏县知县63位，编修《夏县志》时，清代一共有33位知县。对这个知县群体，我觉得可视为一种文化现象“知县文化”予以探究。

首先我注意到，这些知县来自全国各地，彼时交通落后，路况较差，鞍马劳顿，千里迢迢，耗时费力，那古代为何要异地为官，跨省任职呢？

这种为官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

秦朝，其绵延千年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回避的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。因此“为功名走遍天涯路”是古代官宦生涯的真实写照，从他们步入仕途起，基本就注定了要离开故土，在不同的地方辗转奔波。这是因为我国古代为防止官员结党营私，规定了地方首长的属籍回避制与三年一届任满轮换制，也即所谓的“仕宦避本籍”制度。

众所周知，中国古代社会是家族宗法制社会，家族极易形成强大的地方自治，从而对中央构成威胁，为了防止家族势力垄断地方权力，封建王朝实行异地为官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其次，身为外地人初来乍到，人地两生，可以放开手脚做事，没有后顾之忧，从而尽可能地把朝廷的政策贯彻下去。

再次，这些知县的出身，成分比较复杂，举人多于进士，还有贡生。彼时成绩优异的秀才可入京师国子监读书，称为“贡生”，意为以人才贡献给皇帝。

按正常途径，有进士资格才能做知县。但是，考取进士太难，自古有“五十少进士”之说，实乃“天下第一考”。清朝一共进行112次会试，登记的进士有26849人，平均每年只录取100多人，许多州县几十年都出不了一个进士。即便是举人的录取率也很低，选拔举人的乡试三年一次，直隶省每三年只录取120人，有些省份则更少，而全国的府、州、县该需要多少官吏呀，如果只靠进士填补空缺根本无法满足需要，因此明清两代，担任知县的主力军还是举人，明代大清官海瑞就是举人出身。彼时举人也相当稀少，物以稀为贵，因此，举人在封建社会的含金量相当高，不仅全家可以减免赋税劳役，本人上堂见县官、知府不

用跪拜，且不用受刑，还始终保留着候选官员的资格，无怪乎吴敬梓笔下的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，乐极生悲。

职官后特设“宦绩”一节，记述知县们在任期内的政绩，不过寥寥数语，那也是能对官廉吏的肯定和褒扬，也是对预备官员们的告诫与激励——做一个好官，就能青史留名，在县志里郑重其事地给写上一笔。

在此，特别要提到金朝时的县令王庭直，其“宦绩”记载如下：“王庭直：寿春人，皇统八年为夏县县令，文学政事，蔚有可观，当谒温公墓，感杏蟠龟跌之异出碑土中，摹刻嵌壁间，祀名宦。”这正是司马温公祠里著名的“杏花碑”的来历：公元1086年，司马光病逝，宋哲宗赐写温公神道碑额“忠清粹德之碑”，苏轼撰写碑文。公元1093年，高太后去世，宋哲宗亲政后，受章惇蛊惑，遂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，砸毁所赐之碑。半个世纪后，夏县县令王庭直拜谒温公墓，在墓侧一株老杏树下发现被毁的“忠清粹德碑”残石，重予摹刻，余庆禅院守坟僧园珍也参与此事，在禅院法堂之后设“温公神道碑堂”，将断碑四块、哲宗题额及王庭直跋《重立司马温公神道碑记》，分六石嵌于四壁——因了此番功德无量之义举，王县令被“祀名宦”，被当作名宦来祭祀。

要说明的是县志中所记近百位知县，其中不乏庸官、贪官，但多数官声不错，有其“宦绩”佐证。

时过境迁，他们已走向历史的深处，只留下一个模糊不清的背影，甚至完全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，但我们没有理由遗忘他们，毕竟这些知县在我们脚下这方古老的土地上，洒下过辛勤的汗水。

生活史

古人也爱研学游

□刘中才

古人把研学称之为“游学”，兼有“游玩”和“学习”两层含义，游学最早始于至圣先师孔子。

游学到底有什么好处，这个问题孔子已经作出回答。《论语·里仁》中记录过孔子关于游学的言行：“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”“士而怀居，不足以为士矣。”意思是说君子不要留恋故土，应该通过游学四方增长个人见识，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和抱负。

孔子认为游学之利是不言而喻的，边学习边游历，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既看到了自己的不足，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；既实现了“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”的美好夙愿，又增加了人生阅历，提升了修养境界，这样的好处何尝不是今人所愿。所谓的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

因此，孔子意识到游学的好处后，经常带领自己的弟子周游列国，通过学习各国所长，开阔视野，增进学识，历朝历代许多文人雅士偏爱游山玩水无一不是受教于孔子。

游学的好处之二便是推销自己，为日后“找工作”打下基础，这跟现代人出国镀金略微相似。在古代，凡饱读诗书者，就算怀才不遇，也可以谋得一官半职，起码不会干苦工、做苦力。古人“游学”后，无形之中会增加一个耀眼的光环，身价也会不同程度地翻倍，并为走上仕途打下坚实基础。古代的统治阶级一般认为，凡能外出游学，都曾有过雄心抱负，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各国的治国之策和为人之道，因而会对他们高看一眼。（《现代家庭报》）

谈古论今

科技考古与人的生老病死

□王明辉

古代人到底能活到多大岁数？有的人说50岁、60岁，其实我们发现，他们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。除了大量的小孩死于未成年，拉低了平均寿命外，繁重的劳作、社会动荡是罪魁祸首。那时候，40岁~50岁已经属于高龄了，所以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。

章回小说里说古代人经常“身高八尺”，即使以汉尺一尺23厘米计算，八尺也是非常高了，这是真的吗？

我们通过研究发现，古代人的身高其实跟现代人没有多大差异，北方地区男性平均身高一般在165厘米~170厘米之间，当然也有少量的比如山东大汶口偏高一点，这是少量个体。女性一般来说在155厘米~160厘米之间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病的问题。有的人认为“是不是古代人没有癌症，生活幸福指数比较高”。但其实我们发现，现代人身上的疾病在古代人身上也都有，只是当时因为年龄问题有些还没有开始发作或者不太明显。

同时我们在一些可观察到的骨骼上发现了大量的像腰肌劳损、骨质增生、椎间盘突出等情况，甚至包括心脏病、三高、肠道寄生虫等疾病。

死亡在以往考古中判断是最难的。这人到底具体是怎么死的，绝大多数个体上是无法找到的，这就需要借助其他的科技手段判断。在安阳殷墟遗址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青铜酒器，推测可能是使用青铜酒器饮酒时，青铜器里面的铅过量析出，人饮用这样的酒可能造成慢性铅中毒，导致死亡。

大量的考古学和科技考古的发现，证明中华文化是独立起源的、未曾中断的文明，同时也是多元的文明，既存在在中国文化本身的多元性，也存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因素为我所用的多元性。中华文明正是在发展中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因素，并不断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而发展壮大的。（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
史海钩沉

《三字经》藏着一部袖珍版中国通史

□季云

最初，《三字经》的作者只写到他生活的南宋，也就是“有宋世，一同灭”这一句。随着历史发展，朝代更替，后人不断补充，一直写到“十二世，清祚终”，续写了元明清三史。

《三字经》仅以312字，大约占了《三字经》三分之一的篇幅，就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都讲到了，不仅讲得全，而且讲得准。犹如画家的速写，寥寥几笔，每一个朝代，如在眼前。堪称“考实录”“通古今”的典范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这部袖珍通史，提炼优化了朝代故事和记忆韵律，让孩子们在反复朗读中，沉浸其中，强化记忆。笔者是一个文科生，且历经数次高考，按理强化复习历史多年，可到现在，连中国历史上哪朝接哪代，每一朝代有几个皇帝、又有多少年的历史，很难一口气讲出来。有时涉及魏晋南北朝、五代十国、五胡乱华等内容，难免张冠李戴、讲不清楚。假如小时候背过《三字经》，就能脱口而出：“宋齐继，梁陈承，为南朝，都金陵。北元魏，分东西，宇文周，与高齐。”脉络清楚，乱不了。

《三字经》给出了中国朝代的时序和地基轮廓。对我们来说，接下来，需要做什么？《三字经》同样给出的一个通识要求，即“考世系”“知终始”。

考世系，就是对历代帝王家族传承的谱系，做到有个清晰地了解；知终始，就是对各个朝代的开始与结束、盛衰与兴亡，有个清醒的认知。正可谓“读史使人明智”“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”，古人读史的态度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人们。

那么，怎么做才算是“考”世系？学到什么程度，才算“知”终始呢？《三字经》给出了很有价值的引导：

读史者，考实录。

通古今，若亲目。

《三字经》作者的建议是“考实录”。阅读史书，一定要考察历朝编写的“实录”，这样去了解古往今来发生的事情，就会像亲眼看见一样。

什么样的史书才算“实录”？有两种。一种是记录真实情况的纪传体史书，一种是专门记录某一皇帝统治时期大事的编年体史书。具体读哪些史书，通行的《三字经》版本没有具体罗列，但章太炎的修订版作了这样的增补，不妨参考一下：

凡正史，廿四部，

益以清，成廿五。

史虽繁，读有次，

史记一，汉书二，

后汉三，国志四，

此四史，最精致。

先四史，兼证经，

参通鉴，约而精。

历代事，全在兹，

载治乱，知兴衰。

《三字经》产生于南宋，当时只有十七部正史，最初的宋版只有“十七史”，后来随着逐步的增补，有了从《史记》到《明史》的“廿二史”与“廿四史”的说法。

章太炎增补“益以清，成廿五”的内容，是说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，加上《清史稿》，是当今的人们应该读的二十五史。章太炎增补版《三字经》还提到了《资治通鉴》。清代另一位学者钱大昕也说过：“读十七史，不可不兼读《通鉴》。昔人所言‘事增于前，文省于旧’，惟《通鉴》可以当之。”

从孩子一生的成长来看，学习历史知识，远比历史分数本身重要得多。但中国古代史籍浩瀚如海，通读不太现实，所以，清版《三字经》主张“读有次”，也就是从四部经典开始，即《史记》《前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，这是写得最好的纪传体史书，再怎么简略也不能简略这四部。通过对古代史的学习，达到“通古今，若亲目”的境界。在笔者看来，这哪是看看历史故事书、听听成语故事、背背唐诗宋词就能实现的呢？如果带上这样的知识，再去抵达每一个历史的现场，践行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该会有怎样的共鸣和感悟！（《北京晚报》）